

开埠何价

蓝云舟

联合早报，2017年9月17日

曾有人这么形容奥运颁奖台：颁奖台上，笑得最开心的是金牌得主，其次是铜牌得主，最不开心的则是银牌得主。这虽然有点违反正常逻辑，但一点也不难理解——银牌得主没有铜牌得主开心，是因为他的心里还耿耿于怀，想着“我离金牌就那么近”；铜牌得主想的却是，“原来我离金牌还那么远，能站上领奖台很不错了”。

当然，不只是奥运，任何比赛、排名的前几名都可能出现这样的心理落差，主要说明可能性和现实之间往往不易找到平衡。但其实除了心理上的落差，第二名和第一名之间还有另一种微妙对比，那就是心态上，勇于开创先河者一定有成为第一名的机会，而盼着能从他人身上效仿某种成功模式者，就一定只能屈居第二。

或许是出于这样的担心，前公务员首长林祥源本周在“新加坡政策研究所—纳丹系列讲座”发表主题演讲时，就点出再次开创一个“开埠时期”（Age of Pioneers）的重要性。

林祥源当时引述英国学者格拉布（John Glubb）对历史上不同帝国的研究指出，帝国从崛起至没落，一般都会依序经历开埠、扩张、致富、富足、求知、颓丧等时期。如果以帝国在这些时期展现的特征作为参照，新加坡的一些社会现象恰恰反映了“富足”到“颓丧”时期的一些特征，比如公民责任意识下降、逐利不逐名、百家争鸣但空说不做、物质主义、消极、轻浮享乐。

但新加坡对“第一名”的称谓就真的那么不屑？似乎也不。这个社会仍是每天想方设法把“第一”的头衔往自己身上挂：做不了全球首个采用某新技术的企业，就说自己是区域或国内首例；做不了首个推行某标准的机构，就自诩为首个这么做的私营机构、非营利机构……总之，有第一就可以了。

但这样的第一并没有实质意义，而且严格来说也不是第一，是效仿他人成功模式而得来的“第二”，只是换个包装才成了第一而已。我们自己挣得的第一可能没我们想象的多，但其中应该有“把最多第二说成第一”这一项。

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，是因为多年的成功提高了创新的机会成本。与其冒一败涂地的风险，不如稳稳当地借用已被证实能成功的做法。因为从第二的位置看第一，还能看到追求的目标，但在第一的位置上，前面不知道还能怎样超越自己，后面却还有个穷追不舍的第二。

但越是这么想，就越是把自己能力发挥的顶限设在“第二”。用林祥源的话说：“我们独一无二，但又害怕独一无二，这对新加坡来说太凄惨了。”

能否开创一个新的“开埠时期”，找出那种社会使命、能动性、勇气和刚强，关键就在于此。就如林祥源所说的，国人必须“摆脱这种无助感，这种把事情留给其他人做决定的思维……（开埠）需要不一样的心态，一种自信和建立勇气的心态”。

这里的自信和勇气并不是指故作姿态，不是死活都得把自己的“第二”说成“第一”。自信和勇气是面对着前方的未知数，仔细想清楚自己的动机和目标，然后放手去做。一路上或许会碰到挫折或他人试图影响看法，若能从他人经验中借鉴则借鉴，但更重要的是自己的谨慎和判断。领奖台上的金牌固然光鲜体面，但最珍贵的金牌，在心态而不在表面，在过程而不在终点。